

五四運動在鄉村： 傳播、動員與民族主義

• 卞冬磊

摘要：學術界關於五四運動的研究已汗牛充棟，但普遍認為這是一個發生於城市的現象，以致忽略了這個運動向鄉村滲透的努力。本文借助親歷者回憶錄、新聞報導和時人日記等史料，審慎地還原了五四期間學生群體在鄉村社會展開的民族主義活動，進而發現：從1919年暑假開始，從城市回到原籍的學生紛紛以縣為單位成立組織，在鄉鎮持續地進行演說、演戲與抵制日貨等活動，從而將「五四」帶入中國的鄉間；對此，鄉村民眾常有積極回應，但有時也若即若離，甚至還有冷眼旁觀及抵制者，反映了鄉村民族主義的多種面貌。本文認為，五四運動在鄉村的展開，其意義不在於多少新思想被接受，而在於青年學生取得了在鄉村社會進行組織運作、將傳播通俗化以及與農民交往的實際經驗。

關鍵詞：五四運動 學生 鄉村 傳播 民族主義

一 引言：城外的「五四」

1979年，七十八歲的中國共產黨員陶鈍，回憶起自己六十年前在家鄉山東諸城縣參加五四運動的經歷，許多場景還歷歷在目。譬如下面的這段文字，就細緻描繪了回鄉學生在農村開「反日大會」的情形^①：

反日大會的會場設在劉家河岔，離我家只有二里、十幾個村子最遠的東老莊也不過五里。這十幾個村子，共有十處小學。劉家河岔的張校長得知會場設在他那個村子裏，十分歡迎，答應布置會場的一切。……那時

* 本文為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近代報刊閱讀史及其史料庫建設(1815-1919)」(項目編號：15CXW003)的研究成果。

上層人士認為和農民一樣矮坐不成體統，所以會場要放下小學的凳子，還不夠又向村民借了一些，會場裏的座位全是凳子，而且擺得很整齊。會場周圍的樹上和牆上貼滿了標語。

1919年，陶鈺在山東濟南省立第一中學學習。5月4日以後，北京學生的罷課、遊行和演說迅速蔓延到全國，各地政府為平息事態，決定讓學校提前放假，卻意外促成回鄉的學生將五四運動的影響擴散到地方社會。陶鈺也因此回到家鄉諸城縣，參與和目睹了不少五四運動在鄉村的片段。與許多充滿「先進」色彩的回憶錄不同，陶鈺的記述顯得真實一些，不僅坦言自己處於「其實什麼是帝國主義，我們也還不懂」^②的階段，而且對演講動員、抵制日貨等事件的記述，充滿人情味，讀來令人仿如身臨其境。不過，「真實感」並不是他這篇題為〈「五四」在山東農村〉的回憶錄的唯一價值；若從學術史或對五四運動的書寫來看，該文也許有另外一層重要的意義：這是為數不多的對鄉村社會進行直接描述的史料。

學術界關於「五四」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主要將其置於新文化或啟蒙運動的範疇予以思考。舒衡哲(Vera Schwarcz)將五四運動視作中國的一個「凝縮了的啟蒙歷史」，認為它「只是一個極其短暫的事件，一個在一系列政治和社會革命的間隙中展開的思想活動」^③。這種注重思想或文化的研究路徑蔚然成風，但受到陳曾燾的批評：「過於關注文化或政治，以致扭曲了運動的性質，模糊了五四作為社會現象(social phenomenon)的意義。」^④德利克(Arif Dirlik，又譯德里克)也指出，對「五四」的注意力過於聚焦於思想的結果是，「思想漸漸脫離它們的社會甚至社會內容，以致五四思想成了脫離歷史的抽象」^⑤。相較而言，周策縱將「五四」看成一個綜合而複雜的現象，既是新文化意義上的「五四運動」(May Fourth Movement)，也包含作為社會政治運動的「五四事件」(May Fourth Incident)——「若分開兩者，它們都無法被充分說明，更無法了解這一時代」^⑥，這種說法更為平衡地勾連思想/知識與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繫。

不過，無論是將「五四」看成持續的新文化運動，抑或僅是起始於1919年5月的較為短暫的歷史事件，現有研究多以城市為主要關懷對象。葉文心的研究即表明：「五四運動在浙江省實際上是一個城市現象。當消息傳播到省時，只有杭州、寧波和溫州三地給予了回應，其他地方則沒有甚麼動靜。」^⑦這個現象無可厚非，因為就「五四」自身而言，無論是運動或事件，其展開的場所、涉及的人群、期刊發行的區域，都以城市為主。一言以蔽之，五四運動主要發生並傳播於中國的城市之中和之間。

但隨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的思考開始涉及「五四」的滲透問題，尤其是向下層社會的擴散。這些聲音一方面是要回應歷史研究視角下調的趨勢，另一方面還可能與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對鄉村實施動員的大背景有關，其成功經驗令學者認為有必要審視在發生時間上與之臨近的五四運動中，學生群體在鄉村與「無界」的鄉民進行的交往。德利克曾說：「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史上的第一個運動這一論斷的真正理由在於：它是一個『普遍性』的運動。正是地理範圍的普遍性，它的影響及於中國大部分城市；正是社會範圍的普遍性，

它聚集了中國社會不同的集團、階級，它的影響甚至擴展到農民中間。」^⑩此語已略微涉及到鄉村與農民，不僅說明五四運動影響範圍之廣，也說明它的滲透之深。王汎森的研究也觸及到這一問題：「目前為止，學界對五四的研究仍然較集中在舉國聞名的人物，對那一群北大老師、明星學生及各省響應的知識青年了解很充分，但是對地方或草根層次的五四研究卻相當之少。」^⑪

在為數不多的強調地方特性的五四研究中，江浙是「下行」的首要區域。葉文心較早便指出：「五四運動在杭州，比較之於北京，本身便代表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求變的訊息。這個訊息來自於中國內地鄉鎮社會。」^⑫瞿駿討論了新文化運動與江浙基層讀書人的連結，其地理範圍包括「江浙地區縣城以下的廣大地域社會，特別是各個市鎮與鄉村」^⑬。徐佳貴以1917到1927年間浙江溫州地區的出版物為文本，探索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可能的『地方』形成機制」^⑭。顯然，這幾個具體研究有別於以往偏向上層/中心的路徑，打開了探索五四議題的新視野；然而，這些研究涉及的人群均是居於江浙鄉村的讀書人或青年知識份子，並非常住的普通民眾。或限於史料，或限於對既有研究路徑的依賴，我們對五四運動在鄉村民眾之中的擴展還知之甚少。

鑒於以上局限，本文借助一些零散的史料——主要是親歷人物的回憶錄、相關新聞報導和時人日記，嘗試探索五四運動向鄉村社會的滲透。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五四運動如何擴散到縣以下的鄉村社會？學生群體如何在鄉村展開動員？鄉村民眾如何回應這些具體的民族主義行動？在嘗試解答這些問題後，本文將進一步解讀五四運動滲入鄉村的歷史意義。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五四運動」，不是在新文化意義上的思想運動，而是起始於1919年5月、持續約半年的政治社會運動；「鄉村」指涉縣以下的區域，其範圍是蕭公權所界定的「鄉村、集市和某種程度的城鎮」，它們「構成了中國鄉村的主要形態」^⑮。

就史料而言，目前出版的五四運動回憶錄基本都帶着意識形態的痕迹，並且由於是事後追溯，有不少誇大其詞的成份，本文多選擇其中偏向客觀的事實性描述；至於五四時期新興勃發的報刊媒介，儘管當時中國新聞業已處在職業化的當口，但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仍遵守「有聞必錄」原則，加上受到愛國主義的影響，難免有宣傳鼓動的色彩，需要審慎地分析。相較而言，日記可能是更好的史料，具有「此時此地」的意義，但可惜的是，幾乎沒有鄉民對此留下過片言隻語，只能依靠一些傳統讀書人或青年知識份子的旁觀記錄，瞥見些許鄉村「五四」的側影。

二 五四運動的滲透

與許多思想史研究不同，德利克強調五四運動所依託的組織形式和傳播方式，「儘管一個激進的組織網有可能在五四運動之前就在跨城市的範圍出現，但這張網怎樣影響思想的傳播和解釋，還是不清楚的」^⑯。誠如其言，五四運動迅速成為一個全國性現象，離不開一個由團體組織、大眾傳媒和人際流動等要素構成的多層次傳播網絡：第一層是北京學生運動的消息傳播到

全國主要城市，引起各省的普遍響應；第二層是各省地方城市將運動擴散到普通縣城^⑮，使之深入到地方社會；第三層則主要通過人際流動，將運動從縣城帶進鄉村，從而觸及向來對政治毫不關心的鄉民。

第一層傳播網絡得益於各省既存的學生組織和大眾媒體，「五四」的全國化相當迅速，「當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之時，推動它的是那些已經存在的組織；使其合理化的則是新思想」^⑯。報紙則起到了傳播消息、引起效仿的作用。儘管民國時期的新聞界屢受政府的控制和審查，但北京學生遊行的消息仍在一兩個星期之後基本覆蓋了全國各省。在北京，政府對遊行示威的新聞嚴加審查，連接各國的電報電線被切斷，但學生依靠外國機構發電報到天津，再由天津轉到上海，進而傳播到全國其他城市^⑰，杭州、紹興、濟南、成都等地很快就接收到新聞消息。譬如，彼時就讀於浙江杭州第一師範學校的陳範予，在5月6日即知曉事件的來龍去脈：「膳後有《時報》來，據云：月之四日下午二時，北京大學生等五千人往各國使館求歸還青島並誅賣國賊陸〔宗輿〕、曹〔汝霖〕、章〔宗祥〕等。警察督過之，及有燒火傷人之行為，陸宗祥〔輿〕有斃之聞，曹及入六國館內，學生被捕甚眾。」^⑱此後，他幾乎每日讀報，追蹤着五四事件的進程。

不過，各省知曉運動進程的步調並不一致。在軍閥統治的時代，新聞的控制與政治立場、派系鬥爭甚至個人性格均有關係。在湖南、湖北和貴州等省，五四運動的消息相對滯後。蔣竹如回憶湖南長沙的情況：「沒有言論自由，新聞全被封鎖。當時長沙《大公報》的新聞稿往往被檢查員臨時抽去。又不准報紙開天窗，編者只好臨時拼湊稿件來填補。五四運動爆發一星期之久了，湖南學生還不能從報刊上得到一點關於北京學生運動的消息。」^⑲湖北和貴州的情況也與之類似。這兩省亦因為當地政府封鎖新聞，而消息稍遲。貴州督軍劉顯世，「下令各報館，一律不准刊登有關外地運動的消息，所以五月中旬以前，貴州社會上對五四似乎毫無反應」^⑳。但5月中旬以後，社會政治形勢的變化、周邊省份學生組織的活躍、省際之間人員的流動，讓新聞審查逐漸失效。當地方報紙開始頻繁報導運動時，湖南、湖北和貴州等省的學生也仿效各地學生罷課，這「可以視為全國學生界實現了一致行動，行動內容、形式基本相同」^㉑。

第二層傳播網絡將「五四」從省內大城市帶到普通縣城。大部分次要城市或縣城的學生運動都是仿效省內大城市而後起的。以福建莆田為例，其學生運動繼福州、廈門各校之後發生：「莆田興奮報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二版載：青島問題日本將承繼德國權利……日前北京各校學生已發生毆毀章曹之舉動。吾閩省廈各校亦紛紛開會籌議抵制之方法，吾莆學生聞此消息後，均憤憤不平，擬將相率罷課。」^㉒

和清代幾乎一樣，民國初期很多省份的縣仍是國家正式權力的最後一環，也是中等學校、傳媒等許多制度性媒介的末端，因此五四運動的消息或影響擴散到此呈現了一定的複雜性與偶然性。一些縣城裏能夠找到報紙的蹤迹，根據陶鈞所憶述，在諸城縣的高等小學裏仍能讀到報紙，但平日不太為人注意：「學校裏有兩份報紙，一份是上海的《申報》，一份是北京的《晨報》，都在校長辦公室裏。《晨報》上已經發表了北大學生罷課的消息，校長和教員

都知道。可是學生平時不看報，教員又『莫談國事』，所以學生們悶在鼓裏。這時向校長室找報看了。學校當局還有點愛國思想，對學生們的行動明地裏不干涉，暗中還支持。」^{②③}住在浙江溫州瑞安縣的張桐是一個熱心國事的讀書人，他在5月13日的日記裏也提及要從報紙知曉運動的消息：「赴三房時，林龍蓀亦在。詢知渠與宗翼同附小輪來。因言近日內北京大學大鬧風潮……正不知目下如何結局，俟報紙來閱之，當得確實消息。」^{②④}由此可知，縣城裏一些識字的人可以借助報紙知曉五四運動的進程。

不過，五四運動在縣城的真正展開，更得益於人際的組織和流動。與以往的反帝愛國運動主要停留於大城市不同，「五四」因緣際會，因為一個偶然而走向了中國社會深處：時值5、6月間，許多地方政府命令學校提前放假，希望以此打散學生，平息風波；殊不知1919年登上歷史舞台的這批學生是已經組織化的行動主義者，他們將計就計，有計劃地回到原籍，並與縣城學校的學生結合，在當地組成各種類似學生聯合會或「救國十人團」的團體，從而將「五四」的影響帶回縣城。陳立明研究江西各縣的學生運動後指出：「當時各縣在外地求學的學生起了傳播媒介的作用。他們把北京、上海、南昌、九江等城市愛國鬥爭的情況寫信告訴家鄉的同學和師友，或者利用暑假機會返回本縣，使各縣的愛國運動更加蓬勃地開展起來。」^{②⑤}陶鈍亦回憶道：「1919年5月中旬，在濟南讀書的學生回到了諸城縣的家鄉。他們都是縣立高等小學畢業的，那時候的小學是七年制，高小是三年。他們在當地有不少同學，多數都熟識。他們不到6月30日學期終了就放假回家，帶來了北京大學的學生為了抗議巴黎和會瓜分中國罷課的消息；也帶來了濟南各校學生響應北大學生罷課宣傳的任務。」^{②⑥}由此可見，暑假回到原籍的學生在此傳播過程中發揮了媒介和組織作用。

第三層傳播網絡是將「五四」從縣城進一步下移到鄉村的行動。格里德爾(Jerome Grieder)指出，五四運動本來「並不包含深入農村或喚起農民政治責任感的長期打算」^{②⑦}，然而學生回鄉成立的地方組織和他們對喚醒民眾的期待，促成了五四運動在鄉村社會持續數月之久。周策縱注意到當時的普遍情形：「所有的學生都返鄉，將運動發展到鄉野之間。與武漢學生相似，杭州的學生也在5月28日分散回家，各人在鄉下活動。」^{②⑧}上文提及的陳範予也在5月29日從杭州回到諸暨縣，在家鄉發起組織「勸用國貨會」。6月30日，他在日記裏寫道：「忽又至縣派代表方某來，有宣言書及章程、啟事等印〔刷〕物，定省為旅杭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中分六部：演講、調查、糾察、社交、庶務、販賣等是。」^{②⑨}陳的記載顯示了縣域學生組織的基本情況。

與第一、二層傳播網絡不同的是，五四運動在鄉村的擴散很少見到報紙的身影，而主要依靠人際流動。有些鄉村居民從省城帶回消息，如近代著名地方史家、居於山西太原縣赤橋村的劉大鵬，就透過親人和村民得知五四運動的消息，據其日記記載：5月11日，「珣兒自省歸言：省城各學校之學生，各執小旗，書『討賣國賊』等字，奔走呼號，向督軍府而行。詢係留東（日本）學生因駐日公使章忠宣（宗祥）將青島私賣於日本，迫章返國至天津，用炮擊章，而步軍統領捉拿一十九人下獄，議治該留學生之罪，都中各校一齊罷課，以救在獄之學生，吾晉省城亦然」^{③⑩}；31日，又知曉學生的罷課與演說活動，

「里人王劍自省歸言：省城各學校學生均行停課，每日分班在街市演說，現在官吏皆為賣國賊，以〔已〕將山東、青島私賣於日本也，北京學校如此，各省學校亦皆如此」^①。這兩段記錄說明，鄉村社會的民眾通過人際的流動，也可以對五四運動的發展知曉一二。

不過，以縣城為地方立足點、通過各類小團體組織起來的學生，在鄉村開展的各種面對面的演說、演戲和抵制日貨等活動，才是五四運動影響鄉村的主要方式。在長沙，6月12日以後，學生「按縣組織演講團」，隨後「長沙縣各鄉鎮在省學生亦即組織了長沙各鄉鎮回鄉講演團聯合會。六月中旬左右，各縣回鄉講演團都回到了各縣」^②。而原籍浙江仙居縣的陳靜秋的回憶，也證實當時出現了這種逐步下移的學生組織：「同學各自回家，我是仙居皤灘人就回皤灘」，「回家前夕，我會同仙居籍的六中同學和省立第六師範學生二十餘人，到仙居後又邀請寶相寺小學的校長、教師共約三十餘人組成宣講團」^③。其後，他們到仙居縣的各鄉鎮進行演講和提倡抵制日貨。這些從省城回鄉的大學生，在「縣」層面聯合當地教師、中學生組成小團體，進而再「下行」到鄉鎮，是鄉村民眾知曉和接觸五四運動的關鍵。

這種情況在各地非常普遍，並引起地方報紙的關注。譬如，5月21日，江蘇《時事新報》報導常州學界聯合會赴鄉鎮演講：「學界聯合會議決本星期日派員在城區及奔牛、橫村、戚墅堰各地講演，是日擔任各講員分途出發。」^④6月3日，天津《益世報》報導北洋大學演講團：「其演講地點注重鄉間，如楊柳青、北倉、南倉、塘沽、及附近數十里以內，均有該校演講團之足迹。」^⑤6月10日，湖北《漢口新聞報》報導：「武漢各校學生歸鄉後，該縣學生仍互相聯絡，或三人或五人在各鎮市分途演講，慷慨激昂，痛陳口〔日〕國人強取青島之禍，並勸同鄉父老昆弟，嗣後須購用國貨勿買舶品，以示抵制。農民莫不為之動容，每演說之際，鄉人贈送茶點，惟恐中途輟講。」^⑥7月10日，天津《益世報》又記錄鄉鎮居民抵制日貨，「有聲言不買日貨者，志極堅決，有就地代為發揮者，有組織十人團者，有流涕者。故現在外貨銷路漸少，大約一鎮之內十之七八」^⑦。類似的新聞不勝枚舉，到1920年初仍大量出現，說明五四運動曾經切實地在鄉間持續了一段時間。

三 演說、演戲與抵制日貨

通過上面的三層傳播網絡，五四運動不僅實現了橫向的地理擴展，也嵌入到中國社會的縱深之處。特別是在1919年6月以後，從省城回到原籍的學生紛紛在縣城組織起來，再深入到鄉鎮、集市和村落，他們在地方的活動，「基本出以遊行、演說（相應生成面向地方民眾的白話演講稿）、抵制仇貨（同時提倡國貨）等形式」^⑧。這些活動構成了五四運動獨特的圖景，使之有別於近代中國以往的城市民族主義運動。

這一系列鄉村活動，可以看作是晚清以來知識份子對「下層社會啟蒙運動」的延續^⑨。事實上，學生在城市宣傳時就已注意到識字不多的下層市民、

工廠工人、勞動或苦力界人士。因此，運動中的印刷品、動員的形式、演說的用詞，都呈現出通俗化傾向。譬如，武漢學生聯合會就要求「注意下級平民的通俗教育」：「其辦法：（甲）刊印學生報傳播時事及本會真精神。（乙）刊印各種通俗小冊子，或送閱或廉價發售。（丙）定期演講，以傳播時事及通俗科學日用常識。（丁）演有意義的新劇。如上述，則下級平民藉此固能得多少覺悟，一改其今日昏迷不醒之狀態，即吾輩學生亦藉此有磨煉其實際才幹……之憑藉。」^{④0}

當運動深入到鄉村時，「下級平民」的範圍就進一步擴大了，喚醒「一團散沙」的鄉民引起了學生的興趣。以天津南開學校為例，其學生報《南開日刊》在6月3日報導：「本校演講科，以城鎮人民智識日開，而鄉間仍為閉塞，故該科每日分發若干隊往南北各村講演，期一般平民得稍知中國現狀。並聞上禮拜六日，王君在豐、葉君崇智等十餘人乘船至大營莊演講，頗受該處人民歡迎。」^{④1}將城鎮和鄉村的群眾予以對比，反映了學生欲啟蒙鄉民的一般心態。

6月以後，學生在鄉村的活動逐漸常態化，他們往往選擇人流較多的集市、戲場或廟會進行演說。陳靜秋回憶道：「凡是演戲的地方，我們都整隊前往演講。第一次先去村莊大，人口多，族性又強的埠頭戲場」，「還爬山越嶺到十三都娘娘殿等地去演講。記得去娘娘殿時，正值農曆七月七，是娘娘殿一年一度的廟會。那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去進香拜佛看戲的有兩三千人，趁這個大好機會演講，果然收效頗大」^{④2}。除了戲場和廟會外，集市也是農民定期的聚集點，因而是演講的好地方。譬如，貴州息烽縣學生聯合分會「利用場期〔鄉鎮設有集市的日期〕，分成東、西、南、北、中五個小組，到農村進行巡迴宣傳。每逢趕場天，不論風雨陰晴，各小組都奔赴自己所負責的集市去進行演講宣傳。演講股的活動一連幾個月沒有中斷，全縣凡有場期的居民點都傳遍了他們的聲音」^{④3}。

就演講的過程來說，陶鈺的回憶涉及當年山東一位新式女性在反日大會的表現。這位女性在裝扮上吸引了鄉民注意，他們「從來沒見過大腳板，走路來一掀一掀的樣子，也沒見過長裙子、蘑菇髻」，「覺得很是稀罕」；其演講的內容無外乎是控訴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和提倡國貨之類，陶鈺認為這位女性的演講很有感染力：「第一句就是『同胞們』！她的講話好像早已背熟了：從日本帝國主義要侵略中國，先從山東下毒手；全國四萬萬同胞，山東3,800萬同胞要當亡國奴開頭，越說越激動，忍不住聲淚俱下，嗚咽的聽不清講的甚麼了。」^{④4}

相較演講，演戲可能是更受鄉民歡迎的活動。在運動期間，很多學生排練出《朝鮮亡國恨》、《刺殺伊藤博文》、《打倒賣國賊》、《中國魂》之類的戲劇，將反帝和救國的主題嵌入其中。其時，作為教會學校的浙江嘉興秀州中學也進行了罷課。學生除了組織宣傳隊到街上貼標語、演講以外，還成立了一個二三十人規模的愛國劇社。嘉興縣附近的四鄉城鎮都派人前來邀請，促成了愛國劇社在鄉村的巡演活動。顧仲彝是愛國劇社的一員，他回憶起演戲的一般場景：「上演前三小時廣場上就擠滿了人，大半是農民和工人，各種飲食攤販的叫賣聲，就像趕廟會一樣，那時天氣熱，我們喜歡在晚上演出，比較

涼爽，也比較安靜。戲一開場，台下站得慢慢地看不到邊，台前樹上也攀滿了人；而演戲的效果往往不錯，常常引起鄉民的「共情」：「我記得演《朝鮮亡國恨》一戲，演到最沉痛的時候，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台下高呼口號，全場響應，其激動與熱烈的場面，雖然時隔四十年，我還能記得清清楚楚。」^{④⑤}

除了宣傳民族主義之外，學生還把城市的抵制日貨運動照搬到鄉村來。葛凱 (Karl Gerth) 指出：「傳統上關於這個時代的解讀過份強調了學生在形成政治精英文化變革中的作用，而忽視了抵貨運動的重要性，(事實上) 抵貨運動由於使消費民族主義化而處於『五四運動』的核心地位。」^{④⑥} 確實，抵制日貨是五四運動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議題之一。譬如，熊宗仁敘述了貴州的情況：「演講團在貴陽城內宣傳了十多天，走遍了大街小巷。然後，他們又分成若干小分隊，肩挑貨擔，舉着橫幅、旗幟，到城郊各集鎮進行巡迴宣傳，把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的活動向農村擴展。」^{④⑦} 陳靜秋也回憶道：「宣講團……出發到埠頭、橫溪、蟠灘、板橋、白塔、曹店等村鎮，在熱鬧的街上宣講並檢查日貨。發現日貨，當即蓋上宣講團圖章，說明賣完為止，以後不得再販賣日貨。」^{④⑧} 陶鈍亦有在農村檢查日貨的經歷：「我們村裏就有幾個肩挑貿易的小販，他們收購鄉下的雞和雞蛋挑到青島市去賣了，買上火柴、紅白糖、香煙和各色的線等物回來。這些人都是我的鄰居和同姓叔伯或者哥哥。我在城裏查日貨他們是知道的……」^{④⑨} 這些片段說明了由學生主導的抵制日貨運動在鄉村社會的普遍性。

四 鄉村民族主義

對近代中國而言，五四運動中出現的抵制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不是甚麼新鮮事。從1895年起，德國佔領膠州、拒俄運動、抵制美貨運動等，均在不同程度激起一種「防禦式」的民族主義運動。但這些情緒或運動基本在城市中蔓延，很少涉及鄉村社會。即使1905年抵制美貨的人「涵蓋了社會各個階層，包括商人、官員、學生、知識份子、新聞記者、家庭婦女、店主、苦力、船夫，當然也包括廣大村民」^{⑤⑩}，但也沒有出現類似1919年學生群體持續而深入地到鄉間進行動員的情況。

鄉村民眾雖然一般缺乏政治熱情，但對外國人卻有一種普遍的仇恨心態。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除了逐漸淪為半殖民地以外，「似乎被農村的貧困、日益嚴重的失業以及老百姓普遍艱苦的生活所困擾。很多中國人因把這一切歸咎於外國的影響及其經濟控制而對洋人產生刻骨的仇恨」^{⑤⑪}。這種情況在中華民國建立後也未見些許改善。1919年學生在鄉村展開的運動，契合了鄉民潛藏已久的情緒和心理。於是，基於民族主義而進行的鄉村演說、演戲以及抵制日貨運動能夠引起巨大的迴響，也就合情合理了。

新聞界記錄了當年很多喧鬧的鄉村場景。譬如，6月4日，天津《益世報》報導南開學校的演說：「本校演講科愛、勇、華三隊員，日前往滄北風山廟、楊柳青等處演講，備受鄉民歡迎，收效有過城市。……又據十五團報告云：敝團連日出發，烈日之下，聽講者甚形踴躍，足證民心未死。且演講於各鄉

里，如宜興埠等村，格外歡迎。」⁶²8月2日，四川《國民公報》報導白沙學界聯合會的演講：「本會特設招待員數名於廟門招待，故聽者達四五百人之多，尤以農人為眾，皆有敦誠樸實之風，聞演說後無不啟其蒙昧發其愛國之心。昔人稱農夫為國民之中堅，信然。」⁶³

絕大多數回憶錄也追溯了鄉村群眾的熱情回應。陳靜秋回憶起自己第一次在埠頭村的演講：「近千個男女老幼鄉親，都肅穆靜聽、同仇敵愾，對賣國賊和日本鬼子的罪行極為憤慨。不僅男青壯年，就是青壯婦女也高喊：『我們團結起來去打日本佬！』『決不做亡國奴！』」⁶⁴即便是關乎商人經濟利益而困難重重的抵制日貨運動，似也有相當可觀的效果。家在山東諸城縣的黃秀珍回憶說，濟南學生代表「去鄉下宣傳，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農民認識到抵制日貨的偉大意義，情願多花些錢也要買用國貨，婦女們也重新學習紡紗，機匠也用土線織起布來。一提起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我國的侵略，沒有不咬牙切齒的」⁶⁵。

這些史料反映了鄉村社會積極回應的一面。不過如本文開頭所說，回憶錄和新聞報導等史料，難免帶有事後追溯或宣傳鼓動的色彩，因此不能排除其中有誇大其詞的情況。正如章清對新文化運動的評述：「對於『影響』的探究，往往將注意力集中於事件的參與者，關注的是『有』；而不受此影響的卻成為『失語者』，皆歸於『無』。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林林總總的『回憶』，所提供的即是『有』的情況。」⁶⁶所以，我們必須審慎地面對這些材料所濃墨重彩的「有」，並嘗試尋找「無」。

事實上，這些回憶材料中也有一些村民反應不那麼熱烈的敘述；進入到這些文字描寫的場景，可以看到運動的另一面。本文開頭所引陶鈺的回憶錄就是其中之一，他對五四運動引起的迴響，有着比較冷靜和克制的敘述，他筆下反日大會的一個場景，似乎更符合普遍農民對於政治若即若離的心態：「不僅會場裏的目光集中向她〔演講人〕，周圍的牆頭上樹杈上都上去了人……會場周圍抬着筐、扛着鋤的男人也聚了不少。我看到會場裏有一部分凳子空着，想去招呼他們來坐下聽聽，可是我不到他們面前還好，到了他們面前，他們抽身回頭就走了。再走向幾個也是同樣，像是趕他們走似的，我就停止招呼了。」⁶⁷

日記的記述可能更接近於事件發生時當事人的心情。很多時候，學生的行動可以激發自然的民族主義情緒，如張桐在5月25日的激動感想：「醒同、公衡、鬱仙均自郡回，俱述演劇之妙，及抵制日貨之學生等並將大街東洋堂俱一律搗毀。未知此後日人有何交涉否，然日人平日藐視我中國已甚，故此次風潮仍日人自取之。」⁶⁸不過，很多人並沒有在民族主義的維度上解讀學生的行為。6月初，山西省的學生來到劉大鵬所在的晉祠鎮，「昨日晉祠有省城模範示教之學生數十人登台演說，中國政府人員均為賣國賊，已將山東青島偷賣於日本，並說日本之害中國已日久，望國人抵制日貨，不與日本通商等語」。對此，劉大鵬的反應卻是「此等風潮，中國皆有，則是一亂機也」，主要關心的是學生運動造成的亂象，日記中更常常出現「這個風潮不小，深恐此大起亂事耳」、「現在中國學生甚多，各省學校林立，意在強國之基即由此而築，而國勢孱強（弱），仍然如前，未見其強乃反因」之類的感慨⁶⁹。事實上，

張綱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在寄給同鄉友人的信中即表達：「今日教育有江河日下之勢，觀於抵日風潮，全國學界已一律停課，則莘莘學子殆無求學思想。」^⑥可見此類對學生群體的負面評價，在當時的社會也許是一股不小的思潮。

如果說演講和演戲較為容易喚起認知和情感上的民族主義，那麼抵制日貨的行動則較困難。五四期間有不少商人藏起日貨，或趁此偷偷將國貨漲價。如前所述，陶鈞亦有在鄉村檢查日貨的經歷，他提到村裏一家「小地主」開的商店，就不太配合，「他們不是不賣日貨，是很快賣完了，看見我們學生就自動招呼我們去查，當然是沒有日貨以後才有這種表現。可是他們賣的〔國〕貨一律漲價了」^⑦。此外，他還回想起那些做小生意的鄰居，他們的反應似乎更合乎人情，顯示了民族主義與鄉村民眾個人利益衝突時的狀況^⑧：

他們〔親戚〕總是避着我，我們之間有了隔閡。我就去他們家裏，他們見了我很恭敬，不像從前那樣自然。他們的精神，顯示出很不安。我環顧他們的小破屋，他們更為難了。自動地說：「窮，沒有辦法，做點小買賣，有碰上這年頭，你說怎麼過呵？」他們的話是實話，我沒辦法說不對。

……我說：「查日貨，本來是為了愛國給日本造成經濟困難，不是和自己的同胞為難。有就賣給他一封〔火柴〕吧，賣完了不辦日本貨就是了。」賣者聽了這話果然拿出一封來。也許是買火柴的出去透露了風聲，買火柴的接三連四地來了，他們害怕買晚了買不到，以後沒有火柴用。

由上可知，五四時期鄉村民眾對學生的民族主義運動有着不同的回應，既有熱烈的支持、中立的觀察，也有對之側目或抵制。也許在認知的層面上，絕大多數人對城裏來的學生持讚賞態度，但回憶錄和新聞報導或有所誇張。其實這種由外辱導致的民族主義情感並不複雜，正如伯林 (Isaiah Berlin) 指出，「就像席勒的『壓彎的樹枝』理論所說的，是一個擁有自己的民族個性的社會受到壓迫和屈辱時自然生出的反應」^⑨。不過，當民族主義要求人們在行動上積極參與甚至是犧牲個人利益時，他們就顯得踟躕不前：那些圍在演說會場外面的群眾，寧願趴在周圍的牆頭上看熱鬧，也不好意思坐到會場中間來；那些販賣日貨的農村小販，在內心深處也不太情願毀掉自己的貨物，這多少反映了鄉村動員的複雜性。

五 結語：下鄉的意義

陶鈞的回憶錄中關於反日大會的最後一句是：「這次反日會開過以後，我們也沒有查日貨，鄉村裏依然風平浪靜。」^⑩若如其言，五四運動在鄉村只是一陣沒有留下痕迹的「風」，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學生下鄉的歷史意義呢？

鄉村向來是中國社會最邊緣卻也最基礎的一股力量，蕭公權指出，「如果不考慮政府對鄉村億萬居民的影響，以及人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環境

下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和行為，就不能充分理解中國歷史和社會」^⑤。1919年，在城市求學的青年有組織地回到自己的農村家鄉，從而使鄉村的「五四」發展為一個特別的運動。一些帶有意識形態的研究曾急切並粗暴地將這種行為與馬克思主義或者中國共產黨的起源聯繫起來，然而，「五四」畢竟不是「被俄國革命所激發、由共產主義知識份子所領導」的運動^⑥，也「從未有人在馬克思主義意義上使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樣的詞彙」^⑦。不過，我們也不能因為鄉村的「風平浪靜」，就否定這一代具有行動能力的青年知識份子下鄉的歷史意義。

首先，從傳播的角度看，必須正面肯定學生群體在五四運動期間的組織化運作。如周策縱指出，北京學生聯合會「是中國第一個以城市為單位聯合所有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的永久組織。在隨後的幾年內，中國所有的重要城市裏，北京學生聯合會幾乎變成了很多類似團體的榜樣」^⑧。除了這些大型的組織以外，學生還倡導建立類似「救國十人團」這種擁有具體目標、容易建立的小團體，「用這種民眾熟悉的組織形式順勢反擊，把它變成了從下向上層層壘積起來的民主的組織」^⑨。從本文的研究看，這類地方組織不僅出現在城市，也普遍下移到地方社會，並落實到「縣」這一空間，構成五四運動向鄉村滲透並持續展開的關鍵環節。這其實並不是十分簡單的事。張桐在1919年8月3日曾記道：「諸兒為北鄉開救國十人團事，是日同劉仲略赴莘塍開議，而南鄉諸生反對者多，恐此會團不易成立也。」^⑩這件事說明，鄉村社會是多種地方力量交織的地帶，頗具正義性的「五四」也未必能像預期一樣總是一路通達。在地方社會，學生能夠利用籍貫、同鄉或師生等資源，組織起相應的團體，殊為不易。

其次，就動員來說，當學生開始面對識字甚少的鄉民，自然要尋找有效的交流方式，從而使自己推廣的思想變得容易理解。儘管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出版了大量的印刷品，從著名刊物到地方報紙都極為通俗淺白，成為當時的主要「風景」，但那些報刊仍是以識字的人為主要對象。對於鄉村社會的很多人來說，他們最能直觀理解的語言是基於口頭形式的。所以，五四期間不僅出現了非常多的白話、歌謠、三字經、順口溜等口頭文學，青年學生的演說和演戲也注意將情感注入到國家政治事件的表達之中，從而引起鄉村民眾的「共情」。歷史經驗表明，這些口頭形式的文化以及情感動員，是將新消息或新思想傳達給農民的最有效的媒介。

最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是，學生在鄉村運動中積累了與鄉民打交道的經驗。如蕭公權所說：「中華帝國的鄉村居民，絕大多數是農民，幾乎都不識字，自古以來大體上都是不主動或不進取的，他們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竭力維持貧苦的生活上。」^⑪五四時期學生必須採取適當的方式才能進入這個群體，就如陳靜秋在第一次演講時，就學會了如何動用鄉村社會原有的權力和文化資源：「一到埠頭，先去拜會區董（區長），請秀才王福堂老先生，向他闡明要演講的情況和主要內容，請他出來主持會場。在得到他的支持，信心大增，我消除了膽怯和其他種種顧慮。」^⑫退一步說，即使在演講時獲得的回應寥寥，學生也增加了對鄉村的理解，畢竟「欲進行真正社會變革的人，首先要

知曉民眾迷信的根源與韌性。走入鄉村與工廠以傳播啟蒙信息，使『五四』青年開始懂得孕育中國傳統積習的真正情境」^⑳。

本文勉力描述了五四運動在鄉村的一些片段。這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序曲，不過隨後的歷史如所周知，中國就此進入了舒衡哲描述的新時代：「一個以鄉村為基地而展開革命的年代。」^㉑

註釋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 陶鈍：〈「五四」在山東農村〉，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五四運動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頁219；212；211；211；220-21；216；220；218；216；220。
- ⑯⑰⑱ 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劉京健譯：《中國啟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頁11；152；3。
- ⑲⑳ Joseph T.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The Making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71), 1; 6.
- ㉑⑳⑳ 德利克（Arif Dirlik）：〈五四運動中的意識與組織：五四思想史新探〉，載王躍、高力克編：《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51-52；50；64-65；60。
- ㉒ 周策縱：〈繁體再版自序 認知·評估·再充〉，載周策縱著，陳永明等譯：《「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頁15。
- ㉓ Wen-hsin Yeh, "Middle County Radicalis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Hang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0 (December 1994): 909.
- ㉔ 王汎森：〈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9年第6期，頁50。
- ㉕ 葉文心：〈保守與激進——試論五四運動在杭州〉，載汪熙、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主編：《中國現代化問題——一個多方位的歷史探索》（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頁200。
- ㉖ 瞿駿：〈新文化運動的「下行」——以江浙地方讀書人的反應為中心〉，《思想史》，第6期（2016年3月），頁51。
- ㉗⑳ 徐佳貴：〈「五四」與「新文化」如何地方化——以民初溫州地方知識人及刊物為視角〉，《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6期，頁57；48。
- ㉘⑳ 蕭公權著，張皓、張升譯：《中國鄉村：19世紀的帝國控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頁13；9。
- ㉙ 需要說明的是，民國初期實行「省一道一縣」三級行政區劃，有些較為發達的城市如蘇州、寧波等也被稱為「縣」。本文所指的「縣」，主要是城市化水平較低、更為普遍的普通縣城。
- ㉚⑳⑳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頁129；148；127。
- ㉛⑳ 坂井洋史整理：《陳範予日記》（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頁85；112-13。
- ㉜ 蔣竹如：〈湖南學生的反日愛國鬥爭〉，載呂芳文主編：《五四運動在湖南》（長沙：嶽麓書社，1997），頁40。
- ㉝⑳⑳ 熊宗仁：《五四運動在貴州》（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頁36；106；69。
- ㉞ 劉一臯：〈「五四」運動中的學生群體行為分析〉，《開放時代》，2009年第10期，頁45。
- ㉟ 莆田縣志編集委員會編：《莆田縣志——「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在莆田（草稿）》（內部資料，1963），頁1。
- ㊱⑳⑳ 俞雄選編：《張綱日記》（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頁260；261；264。
- ㊲ 陳立明：〈五四愛國運動在江西〉，載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江西黨史資料》，第九輯（南昌：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1989），頁44。

- ⑲ 格里德爾(Jerome Grieder)著，單正平譯：《知識份子與現代中國：他們與國家關係的歷史敘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206。
- ⑳⑳㉑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277；278；278-79。
- ㉒ 蔣詢：〈「五四」時期湖南人民的反日愛國運動〉，載周世劍等：《五四運動在湖南》(湖南：長沙人民出版社，1959)，頁80。
- ㉓⑳⑳㉔㉕ 陳靜秋：〈五四運動在仙居〉(1985年4月22日)，載中共台州地委黨史辦、共青團台州地委編：《五四運動在台州》(內部資料，出版年份可能為1989年)，頁21；21、22；21；21；21。
- ㉖ 〈常州學界聯合會赴鄉鎮講演〉(1919年5月21日)，載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五四運動在江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51。
- ㉗ 〈北洋大學講演團赴塘沽及郊區講演〉(1919年6月2日)，載天津歷史博物館、南開大學歷史系《五四運動在天津》編輯組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頁64。
- ㉘ 〈學海潮音之餘波〉(1919年6月10日)，載張影輝、孔祥徵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頁145。
- ㉙ 〈直隸第一中學講演團赴勝芳鎮講演情形〉(1919年7月10日)，載《五四運動在天津》，頁214。
- ㉚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㉛ 〈武漢學生聯合會意見書〉(1919年7月15日)，載《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頁184。
- ㉜ 〈南開學校赴各村講演〉(1919年6月3日)，載《五四運動在天津》，頁52。
- ㉝ 顧仲彝：〈一個教會中學的學生愛國活動〉，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頁785。
- ㉞ 葛凱(Karl Gerth)著，黃振萍譯：《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145。
- ㉟ 黃賢強著，高俊譯：《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中國城市抗爭的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頁98。
- ㊱ 徐中約：〈晚清的對外關係，1866-1905年〉，載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劉廣京編：《劍橋晚清中國史，1800-1911年》，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142。
- ㊲ 〈南開學校講演員赴郊區講演(節錄)〉(1919年6月4日)，載《五四運動在天津》，頁66。
- ㊳ 〈白沙各界愛國熱〉(1919年8月2日)，載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主編：《五四運動在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頁128。
- ㊴ 〈黃秀珍的回憶〉，載胡汶本、田克深編：《五四運動在山東資料選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頁295。
- ㊵ 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與邊緣——《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個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頁55。
- ㊶ 張桐：《杜隱園日記》，1919年6月8日(己未五月十一日)，溫州市圖書館藏，無頁碼。轉引自徐佳貴：〈「五四」與「新文化」如何地方化〉，頁49。
- ㊷ 參見伯林(Isaiah Berlin)著，岳秀坤譯：《扭曲的人性之材》(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頁254。
- ㊸ 蕭公權：〈序〉，載《中國鄉村》，頁1。
- ㊹ 周策縱：〈五四運動的闡釋與評價〉，載《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頁23。
- ㊺ 小野信爾著，殷敘彝、張允侯譯：《救國十人團運動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頁8。